

2014年第4期
总第116期

民俗研究
Folklore Studies

No. 4, 2014
Serial No. 116

“以生为业”:日常的神圣工作

彭兆荣

〔摘要〕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逐渐细致化的社会分工形成了行业形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业、行业、专业愈加紧密地伴随着。如果没有这些行业分工和专门作业,事物无法分类,货物无法上柜,仿佛一个图书馆,没有分类目录如何找到你要的书?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为一部车,那么,各个行业就像是车的各个部件。没有专门、专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社会”便无从谈起。而对于那些行业化的工作,它们是日常的,也是神圣的。我国的行业传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生业;行业;组织;无形遗产

题旨:从日本的“会社”说起

日本的“会社”非常独特,说它“独特”,除了这一语用具有日本语言的表述特点外,还鲜明地反映出日本现代企业的特质,重要的是,它的产生根基于日本传统遗产中的“文化基因”,并注入近代以降外来、尤其是西方现代价值的滋养而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行业组织和制度;这一组织制度将“两极时空”相结合,即将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积淀有深厚传统的日本行会和企业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传承机制,成为日本无形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

“会社”在字面上可以译作“公司”(corporation)。但“会社”所指的公司、企业与西方的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以及社会主体所承载着的文化因子,因此,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Japan Incorporated——日本株式会社”。在日本人的眼里,“会社”是一个社会实体,而这一实体的永久性来自于祖先传承下来的组织制度。每一个“会社”成员不仅有义务传承借名某一个“祖先”的想象性共同遗产,也分享“会社”组织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包括“会社”的永恒存在和“会社”业务的繁荣发展。^①

“会社”作为职业性工作单位是一个现代的法人团体,每一个单位成员都被赋予相关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它不是简单的现代企业模式的复制,是具有各自历史上的理由和文化上的色彩,即拥有一条传统的联接纽带,是一个从“家”到“会社”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传承。换言之,是一份属于日本的文化遗产以及传承方式。“会社”甚至有自己的“会社墓”,会社的供养塔里竖立着“先人之

〔作者简介〕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福建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项目编号:11&ZD123)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日〕中牧弘允:《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黄向华“总序”,何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碑”,纪念活动伴随着各类宗教活动,特别是那些大中型企业,类似的活动很多,而且遍布全日本。^①

日本“会社”的文化遗产和传承方式给我们一个启示:行业组织和制度并非单一性的专业团体,所谓的行业之“名”亦非至关重要;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它具有一种类似“社会细胞”的性质,就像传统的“家”一样。“家”的存续需要靠一整套融汇了价值、观念的社会性保障和继嗣制度,我国传统称为“宗法制度”。行业要维持发展,道理也一样。日本的“会社”将传统“家”的性质和内含移植到了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行业的肌体上打入“家”的烙印,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传承方式。

一、“生业”简谱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看,不少都可看作,或者归入“生业”范畴。^②所谓“生业”大致属于我们今日的行业。人之活于世,“工作”(劳动)为之所必须,故,“生业”(由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不同行业、职业和专业)即为要者。“生业”在古之时大抵指谋生之道;而谋生必有范围、领域、专业。远古之时,细致的专业分化还未形成,人类早期的文明主要指以自然为本的谋生,集中表现为获取食物的方式,故人类学将早期人类的生存、生计和生活方式概括为“狩猎—采集”,随后的“农业—驯化”(西方的“文化”——culture 的本义即驯化、栽培)。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并没有严格的专业性分工,至多只是一种粗糙的工序上的协作、协同,比如众人合作围猎大型猎物等,惟以自然为根本、为根据的获得生活来源。进入农业—驯化时期,分工的社会化越来越成为必要和必需,但“自给自足”的方式决定了分工的性质、范围的有限度。随着劳动力的剩余,城市化(城邑化)的出现^③。特别是商业交换的需求,社会化分工越是细密、专门,行业性质越是突出,行业组织也越发达。

事实上,“城乡”原本是一体性的,英文中 country, countryside 不仅相互指称,而且成为“国家”的原始形貌。我国古代的“建国”最初即建城郭,行业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地位和作为。“国”作为一个国家一家国的实物形制,即以“城”、“邦”的建制确立王与“天”,王与“诸侯”,王与“民”的结构关系。^④因此,“建国”即“建城”,国,实为城郭,专业的工匠便至为重要。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帝三门,国中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等。古代的“家国天下”是以一个具体的城郭为中心向外扩延,它是政治格局的扩张;至为重要者却是融入建筑形制之上的“天人合一”;而“人居中”为其要者,《吕氏春秋·慎势》谓:“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为“中国”的原型。而“首都”大多与“京”(甲骨文𡩶,释义:像高丘上的建筑之形^⑤)联系在一起,既说明地势形态,也说明与“天意”吻合的崇高之意。故商都在卜辞中又称作“中邑”、“大邑”和“天邑”。其实,城邑的原本就是适应社会化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行业与“城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欧洲的行业演变遵循一套独特的逻辑。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行会。在欧洲,行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具有相应的同质性:当城镇脱离了贵族的监护,公社(commune)形成以

① [日]中牧弘允:《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何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1页。

② “生业”,中国古代对“行业”的一种称谓,如《史记·匈奴传》:“其俗,宽则以随畜田猎为生业,急则习战功以侵伐,其性也。”现代社会通常将这种因行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制度和活动称为“业缘”,即因某种行业而集结在一起的行业关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业性保护组织。

③ 世界文明史中早期国家类型和形态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之一,“埃及古代文明”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J. Wilson, “Egypt through Age New Kingdom: Civilization without City”, in C. H. Kraeling and R. M. Adams(eds.), *City Invincib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124—136. 古希腊国家形态被称作“城市(城邦)国家”(city-state),而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古代国家属于“城邑国家”或“城邑国家文明”,理由是城邑是“用城墙围起来的”,与“城市”的范畴不一样(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④ 所谓“立王国若邦国者。”郑注:“立王”至“国者”,《周礼》单言国者,邦国连言,据诸侯。经既单言国,郑兼言邦国者,以其下文有王及诸侯城制,明以王国为主,其中兼诸侯邦国可知。(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61页。

⑤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邑”条,中华书局,2009年,第125页。

后,那些为社会发展充当开路先锋的手工业行会,变成了公社组织基础。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公社里面,政治制度与官员选举都是以手工业者这一市民阶层为基础的”^①。人们往往单从行业的角度进行选举,而法人团体和公社组织的首领常常是同时产生的。反过来说,既然公社是由手工业社会构成的,那么,手工业行会也就是微缩形式。确切地说,它就是公社形成、扩充和发展的一个模型。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与行业制度存在着历史性的逻辑关联。

欧洲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专业的志愿组织“行会”(guild)——出于某种特殊意愿和行业要求建立的组织制度。它们承担着许多类型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养护,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种“生业”组织;许多行业有着严格的行业性保护组织(某些行业出于保守行业秘密、维护行业垄断、保护行业技术和技艺等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在遗产的养育和传承的功能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变迁,涂尔干援引瓦尔沁的观点:“罗马由工匠组成的法人团体远不如中世纪法人团体那样具有职业色彩。那时并没有什么方法上的规定,没有强迫学徒的事情发生,也没有行业垄断现象,而且它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积累资本去创办一家工业企业。”法人团体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其为一种宗教社团,每一个组织都有各自特有的神灵,每一个社团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即“社神”(Genius collegii)。正因为这种组织具有宗教性质,所以工匠的社团需要组织专门的集体活动和祭祀仪式,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敬社”和“敬家”。^②

行业通常与早期的手工技艺存着历史的关联,所以,大多数与行业有关的无形文化遗产都离不开“用手工作”的性质。在西方,遗产观念的出现和工业革命有很大关系。工业革命以来,都市化进程以及大学教育的出现,各地方语言、传统服饰逐渐消失,农场主和农民开始向城市移动,成为产业工人。民俗作为民间智慧和遗产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正在丢失。于是人们开始怀旧(nostalgia),并产生了艺术和手工艺运动(Art and Craft Movement)。^③一些社会精英和富人开始学习各种传统手工艺,记录保存各种口头民俗传统,他们住在那些具有传统民俗的村子里,向普通人、或民间乐队收集整理资料,他们会写,懂得记谱,甚至请来摄影师拍照片。这个运动非常大,影响了欧洲和北美,大约有5000多名成员参与。

二、行业组织与原初形貌

从可知的文献记载,我国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行业定制,也即所谓“百工”。对此,《周礼·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此不赘述。“行”原指分叉道行,甲骨文作𠂔,其文像是一个十字路,金文大同。本义道路、行走,《说文》释:“行,人之步趋也。”这个字的含义演变和扩大就如其字形一样,越行越宽,基义也变得驳杂;“行业”便独立地成为“行”之历史演化的一个领域;特指从事各种的专门性工作、事务和技术,俗称三百六十行。费孝通先生晚年有一著述,取名为“行行重行


①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渠东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33页。

②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渠东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23—24页。

③ 旧时(1905年首次译入中国)译为“工艺美术运动”,邵宏主编的《西方设计:一部为生活制作艺术的历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认为过去的翻译不好,没有彰显该运动的核心:这场运动试图改变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与手艺人相脱离的状态,弃除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设计与制作相分离的恶果,强调艺术与手工艺的結合。因此邵宏建议采用“艺术与工艺运动”这一更准确的直译名。在国内,该运动多被纳入设计史的范畴,译者综合各相关文献大致可将国人对该运动的认识归纳如下:通常认为该运动的时间大约为1859—1910年,其起因是针对装饰艺术、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等,因为工业革命的批量生产所带来的设计水平下降而开始的设计改良运动,意在抵抗工业大批量生产而重建手工艺的价值。运动的推动者为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等人,也参考了中世纪的行会(Guild)制度。得名于1888年成立的艺术与手工艺展览协会(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该运动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设计史发展。在美国,艺术与工艺运动一般指显示了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或译装饰风艺术)之间时期,即约1910—1925年间的建筑、内部设计和装饰艺术,但其具体涵括范围比欧洲大陆更广泛(参考:维基百科“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词条,http://zh.wikipedia.org,2012-06-16)。

行”,既是道路、又是行走,更是行业。^① 行业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它既是一个生计、生活和生产的需求,也是各个行业协作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社会”就是一个不同生业、行业、专业、职业的相互协作而形成的网络。社会分工也可以简述为:不同的人根据所从事的工作而结成一个松散的社会群体,并被赋予特别的社会价值和等级。换言之,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从事不同工作、工种、工序演变而来的。

行业本义就是分工作业。人活于世,必赖以生计;生计之方式,必赖于协作;协作之社会,必赖以分工;分工之形成,必赖于行业。是为天下道理,社会秩序。所以,行业就社会分工和分层来说,应为社会基础和基本。远古时代,人类为取得食物以满足生计,工具的变革为一个重要的线索。随着历史的变化,一方面,制造和制作工具的专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工艺技术致使分工成为一种必然。考古资料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就有烧陶与居住不同区域的情形出现。到了早商时代,更有冶铜、烧陶、制骨等不同专业作坊的建立。^② 那里的氏族有以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为名字的,如《左传·鲁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给诸侯的商遗族有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终葵氏等。从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分别精于从事绳索、酒器、陶器、旗帜、马缨、釜、篱笆、椎等器物的制造。^③ 另一方面,这种行业职业化社会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氏族社会的原始家庭化行业分工的雏形,透露出氏族社会不同的性别、年龄与氏族的社会化分工的概貌。

行业分工必赖以组织,今天人们常说“组织”,大多已经忘却其本义,甚至违背其本义。追根溯源,“组织”的最初的记忆是丝绸行业;“组织”即从这一行业典出。“组”原指丝带,《礼记·内则》载:“织纴组紃。”疏:“组紃俱为条也。”二者皆从“丝”,甲骨文作状,形如纵横交错,原指“编织”。编织就是丝线互相交织,所以“组织”之最为确切者即经纬交错,织作布帛。《吕氏春秋·先己》:“诗曰执轡如组。”高诱注:“组读组织之组。夫组织之匠,成文于手,犹良御执轡于手而调马口以致万里也。”此比喻非常形象,仿佛一个好的骑手缰绳在握,便可以驰骋万里。借用《中国丝绸文化史》作者的话:“无数的经线与纬线,以各种步同的‘组织’(交织规律)交织,形成不同的结构与表面肌理,再结合工艺方法的应用,就形成了数以百计的丝绸品种。”^④

对中国人而言,“组织”从丝绸说起尤显重要。中国素有丝绸故乡之说,“丝绸”是外国认识中国最为重要的识别之一,古代之“丝绸之路”即代表我国的物质符号和文化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行业分工在远古时代显现出一个外在的形态:男耕女织。这一粗糙的社会性别分工甚至成为历代传承的特殊表述范式,在文学里,“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构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温饱”被简化为外在生计的两个生物性社会需求,它们分别由“女管温”,“男管饱”,即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模式下的男女自然分工;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书·食货志》)这样,性别也就参与了最为早期的社会分工,这又何尝不是行业的雏形。

既然纺织属于“女性”的行业,各行各业有自己的行业神(行业始祖)成了我国传统“业缘”最为基本和基础的建构工作。因此,丝绸之神——蚕神,与谷物之神——社稷崇拜一样,既受到帝王后妃代表家国天下的祭祀,又享受蚕户农家民间香火的供奉。而这位蚕神不是别人,正是黄帝元妃嫫祖,相传这位华夏始祖的正宫“始教民育蚕”。在我国,就像一个氏族、家庭都有一个英雄始祖,以昭英名,示正统。行业亦然,都有一个神话的英雄始祖。嫫祖始蚕在后来的历史典籍中不断出现。《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

①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河南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商代遗址》,《文物》1977年第5期。

③ 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④ 袁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页。

子,其后皆有天下”^①,以正名正统。确立蚕桑生产与农耕一样皆为“国之根本”。因此,相关的行业极受重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可以在传统蚕桑和丝绸发达地区看到林林总总的行业组织。^②

三、“业缘”与传承

毫无疑问,严格意义上的“行业”组织有其具体的行业内容、要求、训练、义务等等。我国在西周(前1027—前771年)时期,官府对手工艺职业就已经有管理制度,但那是从官府的管理角度出发形成的“百工—百官”形制。那个时候的“工”是以“手工”作为基本工作方式,手工艺制作世代相传;所以,从事手工技艺的工匠身份世袭,不能随意改行等。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行”的组织晚至宋代才出现。而“行业”组织的出现随着商业发展而至。这种民间产生的手工艺团体组织,对从业者和其产生有了一些制约。至明清,手工艺商业更为细化,专业从事手工行业人员众多,“行会”对手工艺行业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手工艺行业中的技术,多是世代相传的技艺,几乎不落旁人,由此来保证技艺的独有性,保护手工业者的利益。而行业内的学徒制度又成了保障行业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③从今天的情况看,“行会”的主体是民间、民管、民营的结合体。

在管理制度方面,我国古代在具体的生业管理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管制度,这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管窥,出现了管理军事的职官、管理收获的职官、管理仓贮的职官、管理耕事的职官、管理田猎的职官、管理农垦的职官等等。^④为了配合“百工”的发展,我国古代的“工业”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比如汉代的工官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工匠制度的管理面貌。《汉书·地理志》记载有工官的地名及郡制。《汉书·贡禹传》载“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所谓“工官”,原来指商之臣,《史记·五帝本纪》“工”字正作“官”,工臣者,犹《诗经·臣工》言:“嗟嗟臣工”的臣工。《尚书·酒诰》:“越献臣百宗工”,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国语·郑语》“择臣取諫工”等,都是“臣工”连称,工即官,官即臣。^⑤臣司专务,渐而为专业。《后百官制》云:“其郡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或知其主事制造、税收之务。工官所涉及的部门非常广泛,大抵与手工有关的机构都在其列。体制上看,从现存的资料记载主要有“中央”、“郡”制,中央最为集中,而主持手工业生产管理主要是郡制官署。^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充分发展的工业形制,便不会有工官管理制度。

今天,当人们谈到“社会”的时候,已趋向于将其当作一个“实体性虚指”:所谓“实体”,指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单位,宛如一个“集装箱”(container),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所谓“虚指”,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表述的“替代品”,它被用得越泛,意义也就越无边际。它也可以成为用来表达一种政治制度,比如在“社会”之后加上“主义”。而当这两个字倒装时,“会社”便成为一个带有明确日本化“行业团体”的词语。在我国,“业缘”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讨论的问题。众所周知,“五缘”一直是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研究的重要专题,指血缘(以血缘的直系亲属为计算线索)、亲缘(以亲戚关系为计算范围)、地缘(以同一地方和乡党为关系网)、神缘(以共同的神祇、神灵为崇拜和祭祀圈)、业缘(以同一行业为共同利益和商业发展的所建立的团体)。^⑦五缘时常是一个相互支撑和补充的关系体,“行业”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探讨的是,有些“业

① 参见袁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② 相关的历史可见袁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此不赘述。

③ 参见郭艺:《传统手工艺学徒制度之探索》,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东吴文化遗产》第四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31页。

④ 参见陈年福:《甲骨文词义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⑤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4页。

⑥ 参见刘庆柱:《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⑦ “五缘”有不同的说法,但大同小异,这里采用的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但不论“五缘”指什么,“行业缘”均在其列。

缘”在以农为本的乡土社会和严格的封建等级社会中并不十分宜于生长，而在商业活动频繁、海外交流频繁、远离中央集权、渴望进行华人认同的环境下尤其容易生成和生长。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内部的规矩，即通常所说的“行规”，有的甚至非常严格，它不是现代国家体制中的“法律”的意义，却并不妨碍其在现代国家的生存；另一方面，当其中的一些行业不能适应现代生存的时候，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就行会内部的保障性制度而言，由于“行业”与“职业”、“专业”被置于一畴，因此，“职业道德—行业规章—专业技能”也被同一范畴规定、遵循和执行。一方面，继承行业内部形成的共同体资源；另一方面，使传统的业缘和行会的发展更加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

结语

总体上说，“行业”是一个领域涉及面宽的总称，内容包罗万象；“行会”因此成为各种事业的专门性组织，主要采取民间自治形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曾经实施设立“经济特区”和起用“民营企业”的两大试验；其中一个秘诀正是重启、重视和重用民间力量（特别是闽粤两省籍的海外力量，包括人力、智力、财力等各种资源），而行会无疑是这些力量集结的一种有力组织形式。

当我们再一次检讨日本的“会社”之时，相关的启示便很清晰：当类似于 WTO 这样的贸易组织越来越盛行的时候，那些日趋细致化的行会就越要发展；这就是所谓“小而大”的力量！而当我们重新检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忽然发现，其大者、要者多存在民间“活态”，都是生业传承的产物。而“以生为业”这一日常而神圣的行业却时常为人们所忽视。

[责任编辑 朱以青]